

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变化 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

杨 天 宏

1922年春,中国爆发了自义和团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的运动。这场运动断断续续进行了6年,中国思想界、政界及学界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卷入其中。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思想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的原因,对此,学术界已不乏论述。但以往的研究却相对忽略了20世纪头20年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变化与这场反教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直接引发非基督教运动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也缺乏具体的分析研究。本文有感于斯而作,错误疏漏,敬请批评。

—

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会议召开的先期传出,由此激起上海、北京学界及知识界的强烈反对。学生及知识界人士纷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及“非宗教大同盟”,并向各地发出反对基督教的通电。“一时全国响应,纷纷组织同样的团体,积极地做反对基督教的活动”^①,很快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为什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会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由于迄今学术界对这次大会的论述仍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具体考察一下该同盟的缘起及这届大会的内容。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学生团体。1895年8月,该同盟在瑞典宣告成立,其发起人由美国人穆德、英国人魏良逊和德国人赛尼生等人,穆德任主席。同盟以大学生为活动对象,在各国提倡“基督教学生运动”,并积极推进全世界基督教派实行大联合的“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鼓吹改良主义。《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宪法》宣布同盟之宗旨为:“甲、联络全世界学生之基督教事业及机关而谋互相资助之关系;乙、搜集并布告各国各地之学生状况……;丙、办理下列五种重要工作:子、引导学生接受基督的信仰,承认圣父圣子圣灵而为耶稣的忠实门徒。丑、勉励学生之修灵生活,并提倡切实研究圣道。寅、鼓掖学生努力宣传福音,推广天国于其祖国及世界。卯、联合各国学生,使互相谅解与同情,并使觉悟基督之原理为万国国际之基础,而各努力秉此实行,以期世界统一。辰、淬励三育工夫,直接或间接为学生身体、智识、德性造幸福,使与基督徒之目的相合。”^②根据《宪法》原则,同盟执行部议定了各国基督教学生团体加入同盟必须具备的三项条件:1. 该团体必须为学校内基督徒学生等联合而成;2. 该团体之宗旨必

须与同盟之宗旨合一;3. 必须尽恒心辅助全体之责^③。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后,即致力于发展基督教学生运动,身为同盟主席的穆德更是遍游世界,从事鼓动宣传。1896年8月,穆德第一次踏上中国这块“世界上最大的传教区域”,在中国逗留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和学塾幼徒会(即后来的青年会)第一干事来会理(Dr. D. W. Lyon)一起巡视了上海、济南、烟台、天津、北京、福州、杭州、南京、汉口、宁波等地的主要教会学校。在已有的5个学塾幼徒会基础上,穆德又组织了22个学塾幼徒会。同年11月3日至5日,这27个学塾幼徒会“各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会,产生了“中国学塾幼徒会”这一全国性的组织。该组织由来会理任总干事,决定用中、英文编辑出版《学塾月刊》,促进学生宗教活动。这个组织随即便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除了中国之外,穆德第一次遍游世界的结果,还使印度、锡兰、新西兰、日本、朝鲜等国的协会都成了他所领导的同盟的成员^④。

中国学塾幼徒会加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第二年,便派遣福州协和之神学教员丁敏望充任中国代表,赴美国麻萨诸塞州威立汤城(Willaimstown)参加同盟第二届大会。当1907年同盟第七届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时,中国的与会代表已多达70人^⑤。

1922年以前,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共召开过10次大会。第10次大会是1913年在美国墨航湖召开的。同盟大会一般2至3年举行一次,原定于1916年召开第11届大会,但因当时“欧战正酣,遍地荆棘,致不果行”^⑥。由于延至1922年召开的第11届大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首次大会,且与上届大会间隔9年,因而在同盟历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欧洲各国纷纷请求以本国为会址。经同盟执行部会议研究,这届大会最终决定在北京召开。其原因在于:1. 1913年大会即已议决以中国为下届大会东道主^⑦。当时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显然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信仰自由”这一宪法原则的确立为基督教传教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关。2. 中国符合同盟宪法中召开大会的时机条件。《同盟宪法》第五章规定:除定期举行大会外,“该大会亦得在某国全国大会或数国联合大会时,相机举行”^⑧。恰好在1922年,中国将召开三次重要的基督教大会:一次为5月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一次为8月在庐山召开的学生立志布道团全国大会,再一次为12月在广州召开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干事大会^⑨。这与同盟宪法的规定正相契合。3. 中国代表的反复请求。1913年同盟决定下届大会在中国召开,即与中国方面的请求有关。在1920年同盟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又“请求维持1913年大会之议决,在中国举行”。1921年6月,在荷兰召开的执行部会议上,中国代表再次提出要求,终蔽其事^⑩。

会址确定后,基督教青年会担负了大会的筹备工作。青年会的刊物《青年进步》于1922年2月出版特号,登载了一组有关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及其在中国活动的文章,为召开会议作宣传。此外,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机关刊物《学生世界》一月号亦专门发表了关于中国教会、中国基督教教育以及中国学生的观点等方面的文章,为召开大会制造舆论^⑪。

1922年4月4日,同盟第11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隆重开幕。来自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及中国的550余名代表与列席者出席了大会。大会公推王正廷为主席^⑫。会议的主题是“基督和世界改造”。在穆德等人作了大会演讲后,代表们分六组进行讨论,各组讨论的题目分别为:1. 国际与种族问题;2. 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3. 如何对现代学生宣传基督教;4. 学校生活之基督化;5. 学生在教会中的责任;6. 如何使女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世界上成为更强有力的团体。在这6个题目下,尚列有66个具体的讨论问题^⑬。

由于此届大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首次大会,故会上讨论最为热烈的是基督教与

战争的关系以及相关的问题。在讨论时,有的代表反对对世界上“强凌弱、大残小”的侵略行为施用武力,主张纯以“上帝之能力制服之”,有的代表则主张对侵略行为“取县知事态度,用警察武力制裁之”^⑧。中国的湖南代表在会上“历述近岁两湖兵祸之惨苦情形”,汉口代表主张“武力须分别使用”,北京大学一位与会者则主张对于国际冲突,应首先究其祸源,主张对于殖民政策、军国主义、经济灭国这类战争祸源“当消灭之”。菲律宾代表在发言时谴责了一些国家“口是心非,自私自利,不依基督之教训”的劣行,认为在不得已时可诉诸武力,但反对滥施武力。此外,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等国代表也都各抒己见,表达了基督徒对于战争问题的看法^⑨。大会最后通过一项决议,综合了会上各方面的意见,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我们的绝对责任就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为取消战争的根源而战,为取消利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战”^⑩。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于4月8日闭幕。会议期间,徐世昌以总统身份接见了全体代表。为了保护会议召开不受干扰,北洋政府还特派步兵统领率巡警“莅园维持”^⑪。会后各国代表分成几路到中国各地参观游览。穆德则南下上海,参加5月初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是一次在基督教旗帜下致力于战后世界改造、维护世界和平的会议,这次会议同中国知识界与日俱增的民族主义并不构成冲突。那么,为什么批评者要抓住这次会议作为发动非基督教运动的理由呢?答案显然与教会方面为配合这次大会的召开所作的宣传中公布的大量信息有关。由于这些信息反映了基督教传教事业在20世纪头20年的变化与发展,因此,要真正弄清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原因,还必须对基督教传教事业自本世纪以来的变化发展作一番考察。

二

本世纪基督教传教事业所经历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宣教重心的转移。这不但是中国教会面临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世纪末以来,全世界的基督教会都经历着一种由旧时强调吸引异教徒或非教徒皈依上帝以免沦于地狱之苦到教会应成为传播人道主义的媒介的观念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教会领袖与时代同调,注重基督福音的精神与物质的利益,促进社会改革。这一重大转变的转折点,是1897年丹尼斯牧师(Rev. James S. Dennis)三卷巨著《基督教差会与社会进步:外国差会之社会学研究》一书的问世^⑫。该书用一种现代的、权威的笔调写成,它被热心传教的人士当成有关差会的决定性的宣言而欢迎。丹尼斯在书中把差会说成是当今世界社会改革的一大因素,他认为外国差会的目的应当是提高人类社会,减轻传统罪恶,介绍改革观念。在丹尼斯向差会提出的要求里,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基督教具有促进社会进步,提高西方世界的伟大力量。他认为基督教民族与非基督教民族之间存在一种重要差别,即当前者不能摆脱邪恶时,会有一种精神力量护佑他们,使之不至降低自己的人格。但是对于后者来说,不仅欺骗、盗窃以及各种粗鄙残酷的习俗盛行,而且这种习俗为人们认可,没有人提出异议。基督教差会的任务就在于介绍革新精神与基督教良心,用以反对道德放纵和社会不公正。由于丹尼斯的研究包含了一种新的差会观念,他获得了广泛的尊敬。他应邀到基督教理论研究的课堂上作报告,一些有关传教课题的著作把他称为差会研究的权威。他因此而被选进长老会外国差会委员会(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1910年,他成为该委员会在爱丁堡召开的世界传教大会的

代表^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各国教会传教的“强调重点由个人向社会转移”^⑪的同时,中国的教会也在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到中国来传教的教士由于强调个人信仰的转变,因而将尽可能多的收揽信徒放在传教工作的首位。各个基督教传教组织都大量劝人入教,在各国差会总部拨给传教团体活动经费时,吸引了多少人入教是决定经费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爱丁堡传教大会后,情况已大大改观。乐灵生(Frank Rawlinson)在论述当时教会重点事业的变化时指出:在中国,“宣教福音的方式也有改变,由单一直接宣传变为包括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都用作宣传素材,……二十年前是集中宣讲福音时代的结束。如今在各大城市中正在开展各种各样的传教活动。教会除宣传个人得救外,更使得教者背起十字架宣传上帝的救恩,由神学课程的论题中可以看到,教牧人员的社会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大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基督徒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家问题上,更加关心国家大事。近十年来,教会在使信徒适应社会的工作方面也有很大进展,用信徒发自内心的力量使社会生活基督化”^⑫。

为了适应这一重大变化,本世纪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其一、集中力量于城市以加快其事业发展的倾向。与天主教重视农村,其传教势力无远不至不同,基督教(新教——下同)自近代以来,便十分注重城市的工作。王韬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曾指出了两者在地理分布上的区别:“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⑬但是在尔后 20 年的发展中,也许是出于同天主教竞争,也许是受基督教普遍布道宗旨的驱使,基督教将其势力迅速扩展到了全国城乡。然而,传教范围的扩大势必造成教会人力、物力、财力的分散,这与教会亟亟从事的新的社会事业是不适应的。教会人士开始认识到,“将人力集中于某些地点,对于中国教会的发展与实力及其教徒数目、训练方式的多样化等都有相互关系”^⑭。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差会的势力渐趋集中。从传教士与宣教师驻在地两者的增长情况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据统计,1905 至 1915 年间,传教士人数增加了 55%,宣教师驻在地只增长了 24%,尚不及前者的一半。传教士人数增长率大大高于宣教师驻在地增长率,势必导致传教士集中于大中城市。事实也正是如此。到本世纪 20 年代末,已有 66% 的传教士集居于 5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之中^⑮。指出这一现象对于研究尔后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这场揭橥民族主义旗帜的反教运动仅仅将斗争锋芒指向基督教而不指向天主教?这显然与两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形成的地理分布的差异有关。人所共知,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民族主义运动此伏彼起,愈演愈烈,而城市则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前已述明,天主教注重在乡镇及农村传教,许多传教士都在乡镇及农村工作,远离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基督教则不然,它本身所具有的浓厚资本主义色彩,使中国一般民众不免将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合而为一,这已足以使它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众矢之的。而它的势力又偏偏集中于作为民族主义运动中心的城市,当中国知识界在宗教领域里发起一场批判运动时,它自然也就在劫难逃。

其二、重点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倾向。基督教各差会历来重视在中国发展教会教育事业。本世纪以来,外国教会在兴办教育上投注了更多的心力。1908 年《外交报》载文指出:“庚子以后,彼所心营目注,专以教育为当务之急,建设学校也,推荐教员也,美其名曰扶植中国之文明”^⑯。到 20 年代末,已有“一万名以上的中国男女职员,即几乎等于基督教差会受薪中国职员的半数,贡献他们的全部时间从事教育工作”^⑰。此外,还有大约三千名外国人也从事教育工作。

由于把教育视为教会事业的急务,本世纪头20年教会教育在中国发展迅速。请看下表:

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表 (表1)

年份	学生数	增长指数	根据
1876	4909	1.00	《教会百年记》
1889	16836	3.42	《1890年教会大会记录》
1906	57683	11.75	《教会百年记》
1912	138937	28.30	《中国教会年鉴》
1915	172979	35.23	《中国教会年鉴》
1916	184646	37.61	同上
1917	194626	39.64	同上
1918—19	212819	43.35	《中华归主》
1920	245049	49.93	同上

(资料来源:《新教育》第5卷第4期,1922年11月)

根据表内提供的数据,1920年基督教会学校的学生数已经相当于1876年的50倍!若以1906年的57683人为基数计算,到1920年,学生数亦增长了3.25倍,15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率为22%左右。尤为不可忽视的是,在基督教会所办各类学校中,大学的发展最为迅速。1914年教会全国大会议案曾明确提出了扩充改良教会高等教育的问题,该议案指出:“现因中国政治与社会,俱有极大改革,亟须有教会中人为之领袖。教会值此时期,实为空前之机会。中国之幅员既广,多数人民又注重于教育,故教会高等教育,当即于此时扩充改良。”^②在此思想作用下,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引人注目,到1920年,中国的教会大学已具有相当规模:

基督教大学学生人数表 (表2)

大学校名	程 度			总人数	基督徒人数
	大学预科	大学本科	研究院		
燕京大学	129	123	21	273	167
齐鲁大学	111	142	—	253	235
金陵女子大学	—	60	—	60	54
东吴大学	98	97	3	198	89
沪江大学	15	150	8	173	119
圣约翰大学	—	237	2	239	93
之江大学	35	9	—	44	23
福建协和大学	—	117	2	119	100
岭南大学	—	81	—	81	70
雅礼大学	57	57	—	114	83

文华大学	—	77	—	77	61
博文书院	28	7	—	35	18
金陵大学	157	78	—	235	144
华西协和大学	90	21	5	116	81
总 计	720	1256	41	2017	1337

(资料来源: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下册,第 937 页)

与天主教在华教育事业相较,基督教在教会教育领域已经开始占据优势。1922 年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天主教在华开办的学校为 6255 所,学生总数为 144344 人²⁸。从初等及中等教育的规模上看,天主教比基督教已略逊一筹。在高等教育领域,基督教则更是居于领先地位。当 20 世纪 20 年代基督教在中国已拥有 14 所规模粗具、设备完善的教会大学时,天主教仅仅办起了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三所院校。直到 30 年代,天主教人士都还在作“我圣教办理教育,在以往近于保守,事事落后,每感人材缺乏之叹”,发出了“多设公教大学为当务之急”²⁹的呼吁。

如果与国立学校相比较,基督教教会学校的优势更加明显。1905 年以后,随着科举考试废除,国立新式学堂纷纷建立。然而无论是在办学条件、教学设施方面还是在教员薪俸、学生出路方面,国立学校都难以同教会学校相比。以办学经费为例,教会学校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差会本部或其它国外的捐款,二是学校收取的学费及食宿费等。据有关调查资料,1918 年教会学校的各项收入为 1263358 元,支出为 1079684 元,支出之后,尚略有盈余³⁰。但国立学校则度日维艰。国立学校的收入包括政府拨款、捐款、学杂费、公产收入等,“有些筹款的方式很有意思,有时也很可怜。从前用于迎神赛会、演戏和祠堂的钱,现在有时被用作学校经费。寺院被改为学校,寺院的地产和收入拨归学校。有的地方将赌博执照的收入部分用于教育……”³¹。1919 年,政府用于教育的总经费仅有 650 万元,占政府全年财政总支出的 1.3%。这种情况,无疑反衬了教会学校的优越地位。

然而,在国立教育面临极端困境时,教会学校宛如鹤立鸡群般的优越地位对教会学校的发展也许已潜伏下了某种危机。在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教会学校受到猛烈的攻击,经济地位上的贫富差异所引起的两类学校师生间的隔膜,应当是原因之一。

此外,基督教教会学校对学生宗教活动的硬性规定似乎也构成了对教会学校乃至整个基督教传教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且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不同做法作一番比较。人所共知,天主教中从事教育的神职人员往往来自欧洲,而欧洲天主教会一般都不把教育看作改变人们信仰的主要手段。天主教教会大学课程中一般不设宗教课,只是在课程之外有宣讲宗教的活动。教徒学生固然必须研习宗教,但是对非教徒学生,则吸引他们研究哲学。欧洲天主教通常也不期望非基督徒参加教堂仪式。事实上,庆祝盛典通常都将非基督徒排斥在外³²。然而在基督教学学校里则是另外一种气象。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的教育事业多半为美国传教士所经营从事。美国传教士十分看重学校的宗教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如同对于大多数新教徒一样,福音主义是教区教育的主要功能,因此,基督教学生和非基督教学生都被要求参加宗教活动”³³。在基督教学学校里,宗教课被列为“必修”课程,“在许多情况下,学生被迫每天参加一两次崇拜仪式,每周中期参加一次祈祷会,星期日几乎全部用于宗教崇拜和宗教教育”³⁴。基督教会学校中这一系列

有关宗教活动的硬性规定,尽管出于维持教会学校本身的性质特点的考虑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反对者心目中,这种信仰上的硬性规定无疑是违反宪法有关信仰自由条款的。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学校宗教活动方面的不同做法,对于我们理解非基督教运动中两者的不同境遇,应当有所启发。

三

随着基督教传教重心的转变,本世纪头20年基督教在华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背后也还隐伏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使教会人士在高兴之余又为之焦灼不安。这种喜忧参半的情况除了前面论述过的那些容易刺激非基督教人士民族主义情感的教会教育的发展外,还包括这20年间中国基督教徒人数的增长与增长比率下降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请看下表:

信徒人数及增长比率变化表

(表3)

年代	受餐信徒总数	增长数目	增长比率(%)
1889	37287	—	—
1900	85000	47713	127(11年)
1906	178251	93251	109(11年)
1910	172942	—	—
1913	207747	29496	16(3年)
1914	235303	27556	13
1915	268652	15642	6
1916	293139	24487	9
1917	312970	19831	6
1919	345853	32883	10(2年)
1920	366524	21671	6

(资料来源: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上册,第101页)

从表列数据可以看出,自清末以来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在持续增多,这是令教会人士深感欣慰的。然而自1910年爱丁堡传教大会之后,中国信徒的增长比例却呈现出下降趋势。特别是1914年以后几年,受洗人数的增长率一直在10%以内,其中1915、1917和1920年的增长率仅为6%。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已经将信仰自由写进宪法条款中的民国统治下,基督教信徒的增长率反而大大低于执行盲目排外政策的清政府统治时期。人们尽管可以用信徒“灵性生活”的提高以及教会选择信徒标准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甚至可以用同期世界各国基督信徒普遍呈下降趋势来作分析说明。但是,这种状况无疑是让教会人士深感忧虑的。导致基督教传教事业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基督教各差会之间缺乏“明确的统一计划和有效的合作”。在1913年前后,教会人士开始意识到:“各差会本部和地方教会人士要想明智地制定一个有效的发展计划,目前掌握的资料还不足,收集这些资料极为复杂,并且需要有全面了解一切基本事实的必要性。”^⑧为此,中华续行委办会在鲍引登和司德敷组织下,开始了长达9年的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系统

调查。其调查的目标是:

(一)搜集情况并摘要发表,以使差会负责人能具体了解各差会之间的工作关系,更好地支配本差会的人力物力,使各差会的工作能有效与协调地发展;

(二)找出未被宣教会视为责任地的区域并划定其界限,同时指出那些虽被视为责任地但尚未开展宣教工作的地区;

(三)根据人口和单位面积论述全国宣教工作的现状,按各地具体需要提出各种形式的宣教工作方案;

(四)激发中国基督徒对国内宣教工作的更大热情和更深厚的责任感,通过描述外国传教士人力不足、无法满足更大范围内的宗教需要以激发中国教会的宣教热情,适应目前事业发展的艰巨性和迫切性。

这一浩繁的调查工程于 1922 年以前宣告完成,经编辑整理于 1922 年春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时以英、汉两种文字发表。英文版书名为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除导言、序论及附录外,有正文 14 篇。中文版书名为《中华归主》,只有正文 6 篇。这部调查资料汇编不仅以其书名所包含的基督教文化优越论调和对中国的征服意向构成了对每一个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中国人的强烈刺激,其内容及其表述方式也足以让中国知识界不寒而慄。这部 8 开大本的书,其中文本长达 600 多页,英文本的篇幅几乎倍之。书中共有地图 320 幅,各式图表 125 帧。调查结果表明,本世纪头 20 年,中国基督教徒由 8 万发展为 36 万,增长了 3.5 倍,教堂从 300 座增加为 1 万座,增长了 32 倍,差会总堂的数目也增长了 1 倍。此外,教会的教育、医药、慈善及教会人才的培养等工作也有了长足发展。在介绍这些情况时,该书用了 240 页的巨大篇幅,一省一省地进行历史与现状的比较研究,并在各省地图上标明已经“归主”(或者说已被占领)的区域和范围,以及为特殊的新教教派“保留”下来以便减少重复努力的部分。此外,尚有大量图表、图解说明了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人力车夫、吸食鸦片者、麻疯病患者等各类人中的活动情况。书中甚至还列出了一个 *Table of Urgency*,以指导进一步占领中国。

这部书出版后,传教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司德敷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里更是禁不住内心的喜悦:“看哪,明亮的曙光已在向我们招手。”^⑧但是,该书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将被征服并实现基督化的国度却极大地激怒了中国知识界。非基督教运动发生后,各地非宗教同盟纷纷以《中华归主》中触目惊心的数字来警醒国人,号召国人为摆脱被基督教征服的命运而斗争。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还特别针对《中华归主》的宣传,编成并刊发了《分省中国教毒图》,“将各省耶教流毒情况,详细表示,按照他的教堂实数,用符号一一标记出来,图首有教毒总图两幅,比较教毒漫衍的状况。又附序言及蔡子民先生反对宗教等论文”^⑨,以便肃清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

很明显,从 1913 年开始由中华续行委办会主持的这次调查,是一次既使基督教人士振奋,使他们仿佛看到了教会事业新世纪的曙光,又让基督教人士沮丧,使他们招致反教浪潮猛烈冲击的活动。曙光为其殷殷企盼,浪潮为其始料不及,历史就是这般多情而又无情!

关于 1922 年春季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原因,人们固然可以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等各种层面去探讨,但毫无疑问,本世纪以来教会在华势力的惊人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构成的对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界心理的强烈刺激应当是导致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事物总是趋极而反。虽然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当时并不能令教会方面满意,这种事业更远远没有达到

所能达到的“极点”,但在《中华归主》所掀起的基督教占领中国的密锣紧鼓般的宣传声中,中国的知识界人士却普遍感到教会事业对中国的侵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会方面居然没有预料到一场空前厄运即将降临,这只能说明他们被“基督教占领中国”这一虚幻的现实冲昏了头脑。

注释:

- ①秋人《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怒潮》,《中国青年》第60期第155页,1925年1月。
- ②⑧《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宪法》,《青年进步》第50号第81页,1922年2月。
- ③谢扶雅《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25年小史》,《青年进步》第50号第14页,1922年2月。
- ④Ibid; C. H. Hopkins, *John R. Mott*, P. 185.
- ⑤鲍乃德《中华基督教学生运动发达史》,《青年进步》第50号第23—28页,1922年2月。
- ⑥⑦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青年进步》第49号第90—91页,1922年1月。
- ⑨赵惜时《信徒对于全国大会的本分》,《青年进步》第52号第13页,1922年4月。
- ⑪⑫J.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P. 219—220.
- ⑬《万国学生同盟会开会情形》,《大公报》(长沙,下同不另)1922年4月10日。
- ⑭⑮《对于大会总题“基督与世界改造”及股讨论各问题的感想》,《青年进步》第50号第5—7页,1922年2月。
- ⑯《再志万国学生同盟会》,《大公报》1922年4月11日。
- ⑰⑱《三志万国学生同盟会》,《大公报》1922年4月12日。
- ⑲ *Chinese Recorder*, May 1922, P. 319.
- ⑳ James S. Dennis,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Progres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897.
- ㉑ Pua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eploma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1977, P. 72.
- ㉒ James L. Barton, “The Modern Missionary”,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January 1915, P. 6.
- ㉓⑳乐灵生《近20年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与进步(1900—1920)》,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上册第101、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汉译新版。
- ㉔王韬《传教》下,《菽园文录外编》第6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 ㉕同注㉓。案:J. G. Lutz教授的研究表明,“到1920年,130个(新教)会社赞助了大约6500个传播福音者;一半以上的传教士居住在城市,而且尤其集中在通商口岸。”(见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P. 41.)其研究结果与乐灵生的论述亦十分接近。
- ㉖《申论外人谋我教育权之可畏》,《外交报》第210期,1908年。
- ㉗⑳⑳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下册第888页、905—906、884—885页。
- ㉘《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66页。
- ㉙《天主教之教育事业》,《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1第2页,1922年。
- ㉚孙师竹《多设公教大学为当务之急》,《公教进行月刊》卷4,1932年。
- ㉛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60—61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 ㉜J. G.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0—28*,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1988, Indiana, P. 41.
- ㉝⑳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上册第5页、第23页。
- ㉞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编《非宗教论》(非宗教丛刊第1种)第38页,1922年北京。